

知识分子图书馆

A stylized graphic within a triangular frame, featuring several faces with large, circular eyes and abstract features, rendered in black and white.

本雅明文选

〔德〕瓦尔特·本雅明 著 陈永国 马海良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德〕瓦尔特·本雅明 著 陈永国 马海良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本雅明文选/(德)本雅明(Benjamin, W.)著;陈永国,马海良
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8

(知识分子图书馆)

ISBN 7-5004-2561-9

I. 本… II. ①本… ②陈… ③马… III. 本雅明-文集
IV. B51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2315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4.75 插页:4

字数:376 千字 印数:1—6000 册

定价:23.00 元

《知识分子图书馆》编委会

顾问：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主编：王逢振 J. 希利斯·米勒

编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J. 希利斯·米勒 王 宁 王逢振

白 烨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李自修

刘象愚 汪民安 张旭东 罗 钢

章国锋 谢少波

FF62/32

《知识分子图书馆》部分书目

- ①文学行动* 雅克·德里达
- ②解构之图* 保罗·德曼
- ③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与实践* 斯坦利·费什
- ④批评旅途：六十年代之后* 莫瑞·克里格
- ⑤快感：文化与政治*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 ⑥布莱希特与方法*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 ⑦论解构* 乔纳森·卡勒
- ⑧重申解构主义* 希利斯·米勒
- ⑨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 冈特·绍伊博尔德
- ⑩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 罗钢 刘象愚主编
- ⑪抵抗的文化政治学* 谢少波
- ⑫后革命氛围* 阿里夫·德里克
- ⑬赛义德自选集* 爱德华·赛义德
- ⑭政治无意识*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 ⑮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 特瑞·伊格尔顿
- ⑯本雅明文选* 瓦尔特·本雅明
- 文化研究读本 雷蒙德·威廉斯等
- 历史和人文科学中的历史 拉尔夫·科恩主编
- 全球化中的知识左派 布鲁斯·罗宾斯
- 后现代性的起源 佩里·安德森
- 吉尔·德勒兹：哲学戏剧 米歇尔·福柯等
- 介入的区域 佩里·安德森
- 国际后现代主义：理论与文学实践 佛克玛主编
- 性贸易及其政治经济学 《社会文本》编辑部
- 狱中札记 安东尼奥·葛兰西

（注有*的已出版。）

总 序

1986—1987年，我在厄湾加州大学（UC Irvine）从事博士后研究，先后结识了莫瑞·克里格（Murray Krieger）、J. 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后来应老朋友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之邀赴杜克大学参加学术会议，在他的安排下又结识了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费兰克·伦屈夏（Frank Lentricchia）和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W. Said）等人。这期间因编选《最新西方文论选》的需要，与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及其他一些学者也有过通信往来。通过与他们交流和阅读他们的作品，我发现这些批评家或理论家各有所长，他们的理论思想和批评建构各有特色，因此便萌发了编译一批当代批评理论家的“自选集”的想法。1988年5月，J. 希利斯·米勒来华参加学术会议，我向他谈了自己的想法和计划。他说“这是一个绝好的计划”，并表示将全力给予支持。考虑到编选的难度以及与某些作者联系的问题，我请他与我合作来完成这项计划。于是我们商定了一个方案：我们先选定十位批评理论家，由我起草一份编译计划，然后由米勒与作者联系，请他们每人自选能够反映其思想发展或基本理论观点的文章约50万至60万字，由我再从中选出约25万至30万字的文章，负责组织翻译，在中国出版。但1989年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这套书的计划被搁置下来。1993年，米勒再次来华，我们商定，不论多

么困难，也要将这一翻译项目继续下去（此时又增加了版权问题，米勒担保他可以解决）。作为第一辑，我们当时选定了十位批评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保罗·德曼（Paul de Man）、德里达、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伊瑟尔、费什、詹姆逊、克里格、米勒和赛义德等。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决定独家出版这套书，并于1996年签了正式出版合同，大大促进了工作的进展。

为什么要选择这些批评理论家的作品翻译出版呢？首先，他们都是在当代文坛上活跃的批评理论家，在国内外有相当大的影响。保罗·德曼虽已逝世，但其影响仍在，而且其最后一部作品于去年刚刚出版。其次，这些批评理论家分别代表了当代批评理论界的不同流派或不同方面，例如克里格代表芝加哥学派或新形式主义，德里达代表解构主义，费什代表读者反应批评或实用批评，赛义德代表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德曼代表修辞批评，伊瑟尔代表接受美学，米勒代表美国解构主义，詹姆逊代表美国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伊格尔顿代表英国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研究。当然，这十位批评理论家并不能反映当代思想的全貌。因此，我们正在商定下一批批评家和理论家的名单，打算将这套书长期出版下去，而且，书籍的自选集形式也可能会灵活变通。

从总体上说，这些批评家或理论家的论著都属于“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范畴。那么什么是批评理论呢？虽然这对专业工作者已不是什么新的概念，但我觉得仍应该略加说明。实际上，批评理论是60年代以来一直在西方流行的一个概念。简单说，它是关于批评的理论。通常所说的批评注重的是文本的具体特征和具体价值，它可能涉及到哲学的思考，但仍然不会脱离文本价值的整体观念，包括文学文本的艺术特征和审美价值。而批评理论则不同，它关注的是文本本身的性质，文本与作者的关系，文本与读者的关系以及读者的作用，文本与现实的关系，语言的作

用和地位，等等。换句话说，它关注的是批评的形成过程和运作方式，批评本身的特征和价值。由于批评可以涉及到多种学科和多种文本，所以批评理论不限于文学，而是一个新的跨学科领域。它与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有这样那样的联系，甚至有某些共同的问题，但它有自己的独立性和自治性。大而化之，可以说批评理论的对象是关于社会文本批评的理论，涉及到文学、哲学、历史、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建筑学、影视、绘画，等等。

批评理论的产生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60年代以来，西方进入了所谓的后期资本主义，又称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跨国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之后的时期或后现代时期。知识分子在经历了60年代的动荡、追求和幻灭之后，对社会采取批判的审视态度。他们发现，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文学艺术，出现了种种充满矛盾和悖论的现象，例如跨国公司的兴起，大众文化的流行，公民社会的衰微，消费意识的蔓延，信息爆炸，传统断裂，个人主体性的丧失，电脑空间和视觉形象的扩展，等等。面对这种情况，他们充满了焦虑，试图对种种矛盾进行解释。他们重新考察现时与过去或现代时期的关系，力求找到可行的、合理的方案。由于社会的一切运作（如政治、经济、法律、文学艺术等）都离不开话语和话语形成的文本，所以便出现了大量以话语和文本为客体的批评及批评理论。这种批评理论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大学文科教育的性质，更重要的是提高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辨析问题的能力。正因为如此，批评理论一直在西方盛行不衰。

我们知道，个人的知识涵养如何，可以表现出他的文化水平。同样，一个社会的文化水平如何，可以通过构成它的个人的知识能力来窥知。经济发展和物质条件的改善，并不意味着文化水平会同步提高。个人文化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阅读的习惯和质量以及认识问题的能力。阅读习惯也许是现在许多人面临的一个问题。传统的阅读方式固然重要，但若不引入新的阅读方式、改变旧的阅读习惯，恐怕就很难提高阅读的质量。其实，阅

读方式也是内容，是认知能力的一个方面。譬如一谈到批评理论，有些人就以传统的批评方式来抵制，说这些理论脱离实际，脱离具体的文学作品。他们认为，批评理论不仅应该提供分析作品的方式方法，而且应该提供分析的具体范例。显然，这是以传统的观念来看待当前的批评理论，或者说将批评理论与通常所说的文学批评或理论混同了起来。其实，批评理论并没有脱离实际，更没有脱离文本；它注重的是社会和文化实际，分析的是社会文本和批评本身的文本。所谓脱离实际或脱离作品只不过是脱离了传统的文学经典文本而已，而且也并非所有的批评理论都是如此，例如詹姆斯那部被认为最难懂的《政治无意识》，就是通过分析福楼拜、普鲁斯特、康拉德、吉辛等作家作品来提出他的批评理论的。因此，我们阅读批评理论时，必须改变传统的阅读习惯，必须将它作为一个新的跨学科领域来理解其思辨的意义。

要提高认识问题的能力，首先要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这就需要像经济建设那样，采取一种对外开放、吸收先进成果的态度。对于引进批评理论，还应该有一种辩证的认识。因为任何一种文化，若不与其他文化发生联系，就不可能形成自己的存在。正如一个人，若无他人，这个人便不会形成存在；若不将个人置于与其他人的关系当中，就不可能产生自我。同理，若不将一国文化置于与世界其他文化关系之中，也就谈不上该国本身的民族文化。然而，只要与其他文化发生关系，影响就是双向性的；这种关系是一种张力关系，既互相吸引又互相排斥。一切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与其他文化的联系；只有不断吸收外来的新鲜东西，才能不断激发自己的生机。正如近亲结婚一代不如一代，优种杂交产生新的优良品种，世界各国的文化也应该互相引进、互相借鉴。我们无需担忧西方批评理论的种种缺陷及其负面影响，因为我们固有的文化传统，已经变成了无意识的构成，这种内在化了的传统因素，足以形成我们自己的文化身份，在吸收、借鉴外国文化（包括批评理论）中形成自己的立足点。

今天，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资本的内在作用或市场经济和资本的运作，正影响着世界经济的秩序和文化的构成。面对这种形势，批评理论越来越多地采取批判姿态，有些甚至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因此一些保守的传统主义者抱怨文学研究被降低为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对文本的分析过于集中于种族、阶级、性别、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等非美学因素。然而，正是这种批判态度，有助于我们认识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内在逻辑，使我们能够在全球化的形势下，更好地思考自己相应的文化策略。应该说，这也是我们编译这套丛书的目的之一。

在这套丛书的编选翻译过程中，首先要感谢出版社领导对出版的保证；同时要感谢翻译者和出版社编辑们（如白烨、汪民安等）的通力合作；另外更要感谢国内外许多学者的热情鼓励和支持。这些学者们认为，这套丛书必将受到读者的欢迎，因为由作者本人或其代理人选择的有关文章具有权威性，提供原著的译文比介绍性文章更能反映原作的原汁原味，目前国内非常需要这类新的批评理论著作，而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无疑会对这套丛书的质量提供可靠的保障。这些鼓励无疑为我们完成丛书带来了巨大力量。我们将力求把一套高价值、高质量的批评理论丛书奉献给读者，同时也期望广大读者及专家学者热情地提出建议和批评，以便我们在以后的编选、翻译和出版中不断改进。

王逢振

1997.10. 于北京

前言：本雅明学术思想述略

在 20 世纪西方的思想家中，本雅明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他的思想具有深邃、复杂的特点，人们可以从不同的领域、不同的侧面来认识他。他在哲学、历史、语言、文学艺术诸方面都有不凡的建树，他精心研究过康德的三大批判，写过讨论康德哲学的论文，他对语言提出过独特的见解，并以“语言哲学家”自许，他也曾经期望自己成为文学批评家，写过关于歌德、荷尔德林、布莱希特、卡夫卡、卡尔·克劳斯、波德莱尔、普鲁斯特等作家的论文，研究过德国浪漫主义艺术批评的概念和德国悲剧的起源，研究过超现实主义，他还钻研过犹太教及其神秘主义。不少人说，尽管他主要的研究对象是文学艺术，很少写纯哲学论文，但他的一切研究都是从一个哲学家对世界和现实的体验出发的，因此，他是一个哲学家，而且是一个纯粹的哲学家；^①也有人把他看作一个“诗意地思考”的“文人”，说他学识渊博，但却不是学者，他研究文本及其注释，但却不是语言学家，他翻译普鲁斯特、圣琼·佩斯和波德莱尔的作品，但却不是翻译家；他对神学颇有

① 本雅明生前挚友肖勒姆（1897—1982）就持这种观点，他说：“本雅明是一个哲学家。他的学术活动贯穿了各个阶段，覆盖了所有领域。从表面看，他的主要论题是文学和艺术，有时也涉猎文学与政治之间的题目，而且很少写纯哲学的问题。然而，在他所有的研究领域里，他的兴趣和冲动都是从一个哲学家对世界及其现实的体验中获得的。他是一个纯粹的形而上学家”（Gershom Scholem, “Walter Benjamin” in *On Jews and Judaism in Crisis: Selected Essays*, ed. Werner J. Dannhauser,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6, 177—8）。阿多诺和大部分德、法学者也持类似观点。

兴趣，但却不是神学家；他写文学评论，但却不是文学批评家；^①这种观点的用意自然不在否定他是某一方面的专家，而是要强调他的博大。当然，也有人仍坚持把他看作文学批评家，例如著名文学批评史家韦勒克就把他与卢卡契、布莱希特、德布林同列为20世纪德语文学中的四大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韦氏批评那些认为他不是批评家的学者过分强调他的“犹太性”和悲惨命运，过分强调他的后期著述，而忽视了他1926年之前的前期著述。他认为，本雅明前期的主要贡献显然是在文学批评方面，“无视这一点就会歪曲本雅明的形象”。^②

本雅明于1892年7月15日出生于柏林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接受过较好的家庭和学校教育，由于家境殷实，从小过着优裕的生活，但在充满日耳曼文化氛围的柏林，他总是难于摆脱某种孤独与疏离感，对于学校教育中的专制、压抑和惩罚，常常满怀着厌恶和恐惧，这样的环境促成了他忧郁、内向的性格。1912年本雅明入弗赖堡大学，他的学习方式很特殊，他听各类讲座，广泛阅读文史哲的种种书籍，很少能坚持听完一节课，也从不参加考试。此外，他把相当一部分精力和时间投入了要求自由和自治的学生运动，曾担任过柏林自由学生会主席，积极参加当时维内肯领导的“青年文化运动”，还结识了主张高扬犹太传统，从事犹太复国主义活动的激进学者肖勒姆，并和他开始了长期的密切交往。1916年，本雅明入慕尼黑大学，依然坚持以独立探索为主的自学方式，博览约取，对文史哲中的诸多问题做深入思考，从1917年开始考虑撰写博士论文《德国浪漫主义的艺术批评概念》，于1919年中期完成初稿并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20年代前

① 参见 Hanan A. Arendt, “Introduction” in Walter Benjamin, *Illuminations* trans. Harry Zohn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3) 14—15; 苏珊·桑塔格和许多美国学者都持这一观点。

② 参见 Rene Wellek, *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1750—1950*, VII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182—183.

期，本雅明曾先后向海德堡大学和法兰克福大学申请教授资格学位，都没有获得成功，他为申请法兰克福大学教职而写的教授资格论文《德国悲剧的起源》也未能引起注意，但他却在这段时间内结识了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人物阿多诺和霍克海默。1925年7月，在德国大学申请教授的努力彻底归于失败，本雅明从此开始了以卖文为生的自由职业者的生涯，随后的两年他大部分时间流亡巴黎，在1926年底，还对莫斯科做了两个月的短暂访问，在这段时间里，他修改普鲁斯特的译稿；为德国的刊物《文学世界》撰写书评；开始阅读卢卡契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并和肖勒姆讨论对共产主义的认识；还同布洛赫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完成了随感、杂文集《单向街》；记下了在他死后40年才公之于世的《莫斯科日记》；并开始对超现实主义产生兴趣。从1928年前后到1933年初希特勒上台的5年间，本雅明主要是在柏林度过的，他曾考虑接受耶路撒冷大学之邀，移居巴勒斯坦，出任耶大文学院德国和法国文学教授，并为此学习希伯来文，但随后很快就放弃了这一计划；在柏林和法兰克福电台担任记者和撰稿人；开始和布莱希特以及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霍克海默、阿多诺频繁交往；继续关注他在1927年提出的《巴黎拱廊街》研究计划；撰写了大量的文学评论。1933年3月中旬，本雅明离开德国，开始第二次流亡，这次依然是以巴黎为主要居留地，曾先后移居西班牙的伊维萨岛，数次造访居住在丹麦的布莱希特，寄宿于前妻朵拉在意大利圣雷莫的公寓。在这最后8年的流亡期间，本雅明写出了许多光彩夺目的论文，如《作为生产者的作者》、《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讲故事的人》、《弗朗茨·卡夫卡》、《历史哲学论纲》，为《巴黎拱廊街》的研究做了大量的笔记与思考，最终完成了其中的三篇论文：《巴黎，19世纪的首都》、《波德莱尔时代第二帝国的巴黎》、《波德莱尔的几个母题》。为躲避盖世太保的迫害，1940年9月26日，本雅明在法西边境的逃亡中自杀身亡。

本雅明对语言的思考是他的文学和社会哲学思想的前提。他对语言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他的《论总体的语言与人的语言》、《未来哲学纲领》和《译者的任务》等文章中。

本雅明的语言观是一种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神秘色彩的元语言观，即把语言看作一种广义的精神表达的观点。在他看来，语言并不是人独有的，造化中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精神表达，因此都有自己的语言，音乐有自己的语言，雕塑有自己的语言，一盏灯也有它自己的语言，它表达的不是这盏灯本身，而是这盏灯的精神内涵。因此，“语言不仅与人类精神表达的所有领域（语言总是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内在于这些领域）并存，而且与万物并存。无论在生物界还是无生物界，没有一样事物不以某种方式参与语言，因为表达自身的精神内涵正是每一事物的本质特征。”^① 本雅明把这样的语言称作“总体的语言”（*sprache überhaupt*），在德文中，*überhaupt* 由 *über*（之上）和 *haupt*（头）两个字构成，有“总括一切”、“笼罩一切”之意，因此，这里的 *sprache überhaupt* 就有“笼罩一切的语言”之意，仿佛老子所说的那个经天纬地，无处不在的“道”，这个“道”既涵括各种各样的道，又是它们的根本和元始。同样，本雅明这里所说的 *sprache überhaupt* 也是如此，它既涵括种种语言，又是它们的根本和元始，因而也就具有了本体语言或者说元语言的意味。当然，又不能说它等同于哲学意义上的“本体”，故这里姑且将其译为“总体的语言”。

本雅明把这种“总体的语言”分作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

^① 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 Volume I, 1913–1926, ed. by Marcus Bullock and Michael W. Jenning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62; 下文凡引此书均减缩为 *Selected Writings*。

天地间无处不在的“语言”。

无论是有机界还是无机界，处处都有精神的表达(Mitteilung)，因此处处都有语言。精神表达就其最内在的本质而言只能被理解成一种“语言”，换言之，任何一种“精神实体”(mental entity)都必然有一种与之相应的“语言实体”(linguistic entity)来表达它。万事万物的“语言存在就是它们的语言”。^①在这种“物”的语言的基础上形成的第二个层次则是人的语言。既然万物都有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精神存在”，人同样也有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精神存在，人的语言只是本雅明所谓的“总体语言”中的一种特殊形式。不同的是，人是用词语来言说的，是通过为事物命名来表达自己的精神存在的，因此，“为事物命名乃是人的语言存在”。^②这样，人的语言与物的语言的不同就在于：人的语言是一种“命名的语言”，而物的语言是一种非命名的语言；物的语言向人表达自己的精神存在，而人的语言则向上帝表达自己的精神存在；正是在“命名中”，人把自己的精神内涵传达给了上帝，这就引出了本雅明“总体语言”的第三个层次，或者说最高层次，那就是上帝的语言。上帝的语言是通过上帝的“创造”呈现出来的。作为最高的造物主，上帝的创世是一种明确的语言表述。在《旧约·创世记》中，上帝的创造行动都是以他说“要有”(Let there be)开始，中经“创造”(He made)，最后以“他称”(He named)，即“命名”结束。在这样一个三段式的创造过程中，创造与语言的关系几乎是同一的，说“要有”是语言，“命名”也是语言，可以说，上帝是通过语言创造世界和万物的。在造物的过程中，语言既是创造性的，又是“完成了的创造”，同时还具有认知力和判断力，在《创世记》中，上帝“看”他的创造“是好的”，才完成这种创造。显而易见，正是通过这种

① *Selected Writings*, p. 64.

② *ibid.* p. 64.

具有创造力和认知力的语言，上帝获得了知识。但是，上帝创造人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他不是用词语创造人，也没有给人“命名”，而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他没有给人以语言，却把自己的创造力留给了人，把“命名”的能力传给了人，当他把自己创造的飞禽走兽带到亚当面前时，便任凭亚当给它们命名。本雅明认为，上帝是创造者，而人只是认识者，上帝按创造者的形象创造了认识者，并赋予他命名的能力，上帝的语言就是太初的语言，这种语言具有绝对无限的创造力，人只是这种语言中的认识者，人的语言仅仅来自上帝赋予的命名能力，不论人的命名能力有多大，或者说人的语言能力何其无限，在上帝语言的绝对和无限创造力面前，它永远是有限的。^①从另一个角度看，人的语言仅仅是上帝的语言的“反映”（reflection）。

本雅明指出，命名是语言最本质的特征，不仅是其最终的声音，也是其真正的需要。人是命名者，人的语言是命名的语言，它有明确的目的和意义，作为上帝语言的遗产，这种命名的语言具有完整性，它使上帝的创造最终得以圆满，而物的语言则是非命名的语言，一种“哑的语言”，因而也是一种不完善的语言，它只有通过人的命名才能将自身的精神内涵传达给人。因此，人的语言在命名自然界的事物中具有普遍性。

本雅明在论述中提出，语言表达的特点是其直接性，或者说无中介性（immediacy）。他问到：“语言表达什么？”然后回答说：“所有的语言都表达其自身”，^②他反复强调，所有的精神表达都必须在语言中（in language）而不是通过语言（through language）来进行。本雅明认为，语言的这种无中介性正是它的魅力所在。事实上，本雅明正是要通过这种对无中介性的强调，来批判那种强调语言的工具性的“资产阶级观点”。本雅明认为，语言只是传达

① 参见本书第 269—271 页。

② *Selected Writings*, p. 63.

某种特定内容的工具的流行观点不过是一种虚假的幻觉，语言不是传达的工具，不是手段，不是事物的纯粹符号，必须把语言从这种工具论的泥沼中解放出来。

本雅明强调语言和精神的关系，其语言哲学的核心是与宗教哲学相通的。在他看来，宗教的精神是最高层次的精神领域，上帝的语言是最纯粹的，这个语言和精神的领域表达的是一种神的启示，在那里没有什么是不可表达的。人类的心灵及其语言力图继承这种纯粹性，而包括诗歌在内的一切艺术的语言则处于一个较低的层次上，其语言不够纯净，不够完满，有许多东西是不可表达的，而这种不可表达性来自语言的物性。换言之，由于艺术的语言和精神远离了形而上的天国，更接近形而下的尘世，因而才混杂了更多不纯的性质。至于物的语言，由于完全是哑的而处于最低的层次，是自不待言的。本雅明认为，正如人通过命名把自然界万物从无名和无声状态拯救出来，并纳入上帝的创造中一样，哲学家、批评家和翻译家们也有义务通过批评拯救诗和艺术，把它们从不够纯的精神和语言领域带回到纯粹的境界中。

本雅明语言哲学的核心观念无疑是从浸染着神秘主义色彩的德国哲学传统中生长出来的。这个传统包括了诸如伯麦、哈曼、小施莱格尔、诺瓦利斯、洪堡等人。伯麦哲学思想的根基是神秘主义与泛神论的结合，他认为造化中的万事万物都具有永恒的、统一的精神，这种精神隐藏于可见世界之中，通过具体事物的形态和性质发生作用。上帝是万物的本源，也是这种永恒精神的本源。哈曼作为一个神学哲学家，十分强调信仰的重要，他认为，只有虔诚地相信上帝，才能解决哲学上的难题。他还十分重视直觉经验，重视语言和精神的关系，指出“语言是理性和启示之母”，是万物的终始。小施莱格尔信奉天主教，深受费希特先验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强调纯粹精神的重要，同时强调把浪漫主义概念与中世纪基督教思想结合起来。诺瓦利斯是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诗人，其创作始终浸透着浓重的神秘主义倾向。洪堡作为著名的语